

# 叙事学研究新视野：评尚必武《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

王业昭

**内容提要：**进入新世纪之后，后经典叙事学受到欧美学界高度关注，相关研究如火如荼。相比之下，国内研究则明显滞后。有鉴于此，尚必武教授新著《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具有开拓性的重要意义。该书以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主要流派和核心概念为主轴，在梳理、廓清的基础上，对上述议题进行了再探讨和重新认知。本文在概述《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旨在提炼作者对后经典叙事学主要流派和核心概念的独特见解，希冀以此对读者研读该书时有所帮助与启迪。

**关键词：**后经典叙事学 流派论 概念论 未来发展

**作者简介：**王业昭，博士，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化研究。

**Title** A New Vision of Narratology: A Review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Narratology: Postclassical Perspective*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up>st</sup> century,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is a focus in western academics, while it is insufficiently studied in China. *Contemporary Western Narratology: Postclassical Perspective* explores the major schools and core concepts of western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and sheds a new light on them from a Chinese scholar's perspective. Reviewing this valuable work, the paper aims at highlighting the insights of this work and makes it suggestive to scholars interested in narrative inquires of various kinds.

**Key Words**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major schools; key concepts

**Author** Wang Yezhao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China). His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ed on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 一、引言

经典叙事学以文本为中心，将叙事作品视为独立自足的体系，隔断了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关联，这一特征使其在 20 世纪 80 年代遭到质疑与否定。在这种批评气候下，以语境主义叙事学为特征的后经典叙事学应运而生。自此，后经典叙事学呈现出蓬勃发展之态势（尚必武 1-15）。<sup>1</sup>与后经典叙事学

在当今欧、美学界备受重视形成鲜明对比，国内的相关研究则显得较为滞后。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岁末，尚必武教授新作《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下文简称《后经典》）的出版显得意义非凡。

作为国内首部系统、全面评析西方后经典叙事学主要流派与核心概念的专著，《后经典》以追踪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进程和态势为中心旨趣，着力考察其研究范畴、方法和范式的演进和转移，意在窥探后经典叙事学的存在维度。该书分为上、下两篇，分别以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主要流派和核心概念为主轴，在梳理、廓清的基础上，作者对上述议题进行了重审。本文在概述《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旨在提炼作者对后经典叙事学主要流派和核心概念的独特见解，希冀以此对读者研读该书时有所帮助与启迪。

## 二、对西方后经典叙事学主要流派的梳理与再探讨

《后经典》上篇共六章，分别评述了后经典叙事学的主要流派：诗歌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语料库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叙事理论和认知叙事学。必须指出，在上述章节中，作者并非只是介绍后经典叙事学的这些主要分支，而是在梳理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再探讨，发表了自己对这些流派研究方法、发展方向等方面的见解，这也是笔者在下文着力追踪、评述的部分。

第一章《跨文类的叙事研究与诗歌叙事学的建构》指出在超越文学叙事的跨媒介叙事研究背景下，有必要把“超越小说叙事”的“跨文类”叙事研究提上日程。诗歌叙事学既是叙事研究的“后经典转向”与“叙事范畴的扩展”或“泛叙事性”的双重结果，同时也可被看作是“超越小说叙事”的“跨文类”叙事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此章以建构诗歌叙事学为中心旨趣，主要探讨了：诗歌叙事学兴起的语境；诗歌叙事学的建构路径；诗歌叙事学的批评实践。

诗歌叙事学无论是对诗歌研究还是叙事学研究，都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和路径。但长久以来，叙事理论一直忽略了诗歌叙事这一重要领域。作为后经典叙事学的一个起步较晚，但具有广阔研究空间的分支，诗歌叙事学目前仍处于初创阶段。有鉴于此，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尚必武提出了加速诗歌叙事学发展进程的五个建构路径或方向：诗歌叙事特有的话语属性；诗歌叙事的多元方法；现有叙事学理论与诗歌理论之间的相互借鉴与交流；不同文类的诗歌叙事学研究；诗歌叙事学的理论建构与评判实践并举（25-26）。为验证上述五种路径之于建构诗歌叙事学的可行性和效度，尚必武以英文抒情诗《西风》为例加以分析。

非自然叙事学是一支新兴的后经典叙事学流派，得到了西方学界的热切关注。在第二章中，针对什么是非自然叙事？怎样研究非自然叙事？如何建构和发展非自然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以及后经典叙事学的其他分支之间有何关系？尚必武从四个层面来探讨上述问题：在反模仿叙事层面上辨析了非自然叙事的定义与特征；在故事层面上讨论了非自然叙事对“不可能的故事世界”的建构；在话语层面上考察了非自然叙事所惯用的“反常的叙述行为”；在方法论层面上对非自然叙事学的建构路径和未来研究提出了若干建议。在此

基础上, 作者认为, 要建构和发展非自然叙事学, 研究者必须处理好四种关系: 非自然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关系; 非自然叙事学与后现代叙事, 以及非自然叙事学与后现代叙事理论之间的关系; 非自然叙事学与跨媒介叙事学之间的关系; 非自然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其他分支之间的关系(44-46)。

作为国内首部涉及语料库叙事学研究的专著, 《后经典》的第三章《语料库叙事学论略》主要做了如下几个方面工作: 介绍语料库叙事学的产生背景和前提条件; 评述国外两种具有开创性的语料库叙事学研究, 即戴维·赫尔曼基于语料库的关于动作事件的研究和迈克尔·图伦从语料库文体学视角出发对短篇小说叙事进程的研究; 展望语料库叙事学的研究前景, 并对其未来研究的任务和方向提出建议。书中, 尚必武对图伦的《短篇小说的叙事进程: 语料库文体学方法》进行全面评介。在此基础上, 作者辨析了图伦的语料库叙事学的几个“弱项”: 过于拘泥于文体学分析, 过多涉及作品的遣词造句, 而对作品的整体叙事结构未给予充分考虑; 在叙事进程这一论题上, 过多关注了文本线索之于读者的期待或读者反应的影响; 过多依赖“基于语料库”方法, 而“以语料库为驱动”方法运用明显不足。针对这些不足, 尚教授对语料库叙事学未来的发展提出个人观点: 打破语料库语言学与叙事学之间的学科界限, 促进两者研究界面的整合, 实现叙事学方法与语料库语言学方法之间的互补; 建构各种不同类型的叙事语料库, 进而为语料库叙事学的研究提供支撑; 语料库叙事学还存在许多有意义的研究论题亟待开展(59-60)。语料库叙事学的最大优势是把叙事分析从对具体文学叙事的阐释实践中分离出来, 使得同时考察数量庞大的叙事文本成为可能。鉴于国内研究者普遍对语料库叙事学相对疏生之状况, 作者的上述见解与观点无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降, 以北美为主导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无论是在叙事理论建构还是在叙事批评实践上均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第四章以英国学者露斯·佩奇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文学与语言学视角》一书为底本, 以评述她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为切入点, 并从性别、叙事性、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课题等层面出发, 探讨了佩奇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贡献, 以及其对女性主义叙事学主题的偏离。作者指出, 一方面, 佩奇采用文学与语言学的双重视角, 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另一方面, 佩奇关于叙事形式可以脱离性别的论点又偏离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主流。就其学科属性而言, 尚必武认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未来发展应该处理好下述四重关系: 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之间的关系; 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叙事美学之间的关系; 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其他分支之间的关系; 女性主义叙事学与新型的叙事媒介或叙事形式之间的关系(70-72)。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女性主义叙事学面临着全球化、多元化的挑战。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这些挑战也是女性主义叙事学得以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而尚必武的上述见解也是在为这一重要后经典叙事学流派的发展添砖加瓦。

在第五章中, 作者以詹姆斯·费伦的《体验小说: 判断、进程及修辞叙事理论》

为考察对象，评析了其修辞叙事理论。作者指出，费伦在重访和拓展修辞叙事理论的基础上，以考察读者的阅读体验为主旨，藉“叙事判断”、“叙事进程”之共谋为视角，从叙事理论和叙事批评实践的双重层面，着力探讨读者“以相似的方式，体验相同作品”的可能空间，展示了修辞叙事理论的力量。虽然是当今后经典叙事学领域超重量级专家的扛鼎之作，尚必武亦指出其存在的疏漏与盲点。就宏观层面而言，在叙事判断三种类型之间的关系上，作者认为费伦只注意到审美判断与阐释判断和伦理判断之间的历时关系，而忽视了它们之间也存在共时关系的可能；只注意到阐释判断和伦理判断之间的共时关系或平行关系，而又忽略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历时关系或因果关系的可能；只注意到伦理判断之于审美判断的服务功能，而忽略了审美判断之于伦理判断的服务功能。就微观层面而言，《体验小说》在原先四种伦理取位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修辞目的的伦理，即“整个叙事行为的伦理维度”。但这与已有的“隐含作者”的伦理取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似没有增加的必要。此外，费伦既没有提及关于叙事判断的七个命题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详细阐述叙事判断与叙事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93）。

第六章中，作者以戴维·赫尔曼《叙事的基本要件》为底本，讨论了叙事学研究的两个根本问题：“什么是叙事？”、“怎么研究叙事？”。上述问题不仅反映了叙事学研究的基本立场、方法取向，甚至决定了叙事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和结果。在“什么是叙事？”这个问题上，戴维·赫尔曼提出了叙事的“四分法”（情境、事件序列、建构世界/分裂世界、感应）；在“怎么研究叙事？”这个问题上，赫尔曼倡导包含认知科学、语言学、语言哲学等在内的跨学科方法，为重构叙事学研究的基础工程做出了颇有意义的探索。尚必武对赫尔曼观点解读的基础上，将笔墨放到自己对上述问题的理解。譬如，“情境”是叙事的第一基本要件，在“情境”的研究方法上，赫尔曼提出三种方法：社会语言学方法、话语心理学方法以及叙事学方法，而他的主要立场是综合这些方法的跨学科研究范式。作者则认为，叙事的情境或语境主要包括两种含义：叙事的微观情境，即具体“故事讲述”行为的直接发生语境或直接阐释语境；叙事的宏观情境，即“故事讲述”行为的间接发生语境或间接阐释语境——历史文化语境。赫尔曼只注意到了叙事的微观情境。研究情境的中心参照点是“故事讲述”行为。但是，无论“故事讲述”行为的发生语境，还是“故事讲述”行为的阐释语境，赫尔曼皆拘泥于文本之内，忽略了文本之外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102）。

纵观《后经典》上篇，作者对西方后经典叙事学主要流派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个人见解，指出它们存在的瑕疵或今后的发展方向。上述观点既充分表明作者对这一领域的透彻理解与把握，又体现出他强烈的学术评判精神和敏锐的学术评判思维。

### 三、对后经典叙事学核心概念的廓清与再认知

《后经典》下篇共七章，分别对“叙事性”、“情节”、“隐含作者”、“不

可靠叙述”、“第一人称复数叙述”、“叙事开端”和“叙事聚焦”作了逐一廓清，这对国内相关领域的初级研究者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作为“叙事”的衍生概念，“叙事性”之于理解叙事的本质与表现、叙事研究的方法与目标都有着重要意义。后经典叙事学家奉行“叙事无处不在”的“泛叙事”观，由此导致了“普遍叙事性”的产生。后经典叙事学对经典叙事学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方法和媒介。就方法而言，本章主要讨论修辞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叙事性研究，就媒介而言，本章探讨媒介叙事学视阈下的“叙事性”研究。总之，作者着力从方法与媒介的双重层面透视后经典语境下西方叙事学界的“叙事性”研究。最后，作者认为未来的“叙事性”研究需要紧密结合叙事的其它要素（人物、时间、空间等），避免孤立研究“叙事性”的倾向（128-129）。在后经典叙事学领域，与“叙事性”并举的另一重要概念便是“情节”。在第八章中，尚必武全面评析了希拉里·丹尼伯格的情节理论。作为新时期情节理论的集大成者，丹尼伯格的情节理论可大致归纳为三个方面：情节的三种建构方式（认知、本体和空间）；情节的两大基本类型（巧合与反事实）；情节的两个发展方向（聚合和离散）。此外，丹尼伯格还审视了情节的建构方式、基本类型和发展方向在不同时期、不同文类中的差异与变迁。在重话语、轻故事的研究语境下，丹尼伯格的情节理论有力地推动了叙事学的向前发展。同时，丹尼伯格是以小说情节的主要发展方向（聚合和离散）参照基准，对情节的两种基本类型（巧合型与反事实型）做了一番比较。这样的做法受到普遍接受，但尚必武指出：丹尼伯格主要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小说考辨，得出了“小说情节总体上呈现出由巧合到反事实、由聚合到离散的发展趋势”这一结论，这似乎值得商榷。作者自己认为：小说情节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小说的所属文类决定的（138）。之后，作者又以《莫格街的谋杀案》和《玻璃之城》两部小说验证了自己的观点。

1961年，叙事理论学家韦恩·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中首次提出“隐含作者”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加速了叙事理论的发展，而且也引发了学界旷日持久的争论。在《后经典》的第九章，尚必武在探讨“隐含作者”的含义与提出缘由的同时，对学者们关于这一概念的争论加以全面梳理，并分析他们争论的焦点和实质。全章围绕着“隐含作者”的含义与提出缘由；“隐含作者”的是非之争；以及争论的焦点与实质展开评论，指出在文学批评实践中“隐含作者”依然具有其存在的必要与价值。在此基础上，尚必武认为西方学者有关“隐含作者”的争论实质还在于其定义与来源、和存在、划分“隐含作者”的参照物等方面，并对此指出三点：西方学者争论的焦点在于“隐含作者”的定义和来源；他们争论的焦点还在于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是否具有必要性，即到底存不存在隐含作者的问题；划分隐含作者的参照物也成了叙事学家争论的焦点之一（152-153）。

作为叙事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论题，不可靠叙述引发了当下叙事学界最热烈的讨论。第十章从“不可靠叙述”的原初概念出发，在研究路径上梳理了从布

思到费伦的修辞方法；从雅克比到安斯加尔·纽宁、汉森的认知（建构主义）方法；以及“语法人称”视角；在研究范畴上考察了非虚构类叙事作品中的不可靠叙述。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不可靠叙述”的未来研究提出了四点思考和建议：在发展“不可靠叙述”研究修辞、认知方法的同时，也可不断开辟其研究的新方法、新路径；必须对“不可靠叙述”概念的批判史进行梳理和总结，加强研究初第一人称叙述者之外的其它类型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对中国学者而言，任何结合中国特有的文化语境，考察不同文类、时期、媒介中的“不可靠叙述”是当下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191-192）。

长期以来，叙事学界大多关注第一人称单数叙述、第三人称叙述、第二人称叙述，而忽略了第一人称复数叙述这一重要领地。随着非自然叙事学的兴起，第一人称复数叙述在西方叙事学界迅速升温，成为当下叙事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作为国内首篇关于后经典叙事学第一人称复数的探讨者的专著章节，第十一章重点探讨了第一人称复数叙述的存在样态、指称范畴和意识再现中三个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第一人称复数叙述在未来发展所需要回答的五个问题：对第一人称复数叙述者“不可靠性”的考察；对第一人称复数叙述者的“叙述聚焦”的研究；第一人称复数叙述的历史有待书写；对第一人称复数叙述“受述者”的探讨。文学叙事中的第一人称复数叙述与其它媒介（如法律、报告、歌剧等）的第一人称复数叙述之间的对比研究（202-203）。

“叙事开端”是当下叙事学研究的另一重要论题，引起了西方学者的热烈讨论。与此相反，国内学者对叙事开端的研究则较为生疏，未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第十二章在梳理西方叙事学界关于开端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四个命题：虚假的开端；文学叙事的开端与跨媒介叙事的开端；叙事开端与叙事结尾之间的内在联系；“叙事开端”未来研究的方向和任务。至于第四点，作者认为有如下六个方向和任务值得思考：形成一个统一的关于“叙事开端”的定义；不同时期的叙事作品的开端的研究；不同文类的叙事作品的开端的研究；不同国别、不同区域的叙事作品的开端的研究；不同媒介的叙事开端研究；不同方法论指导下的“叙事开端”研究（214-215）。总之，鉴于国内学界“叙事开端”研究之现状，尚必武的意图在于抛出“叙事开端”这一话题，以求引起叙事学研究同行的关注，推动国内关于“叙事开端”的研究，进而打开这一后经典叙事学核心概念研究的新开端。

自1969年被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正式提出，作为叙事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叙述聚焦”引领无数学者竞相对其展开多维研究。随着后经典叙事学的崛起，学界又掀起一轮对“叙述聚焦”新的研究热潮。在《后经典》的最后一章，作者从早期的叙述视角研究谈起，详细评析经典叙事学视阈下叙述聚焦理论的建构与论争。同时，以女性主义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为例，着力探究后经典叙事学视阈下叙述聚焦研究的新态势，力图从全局上考察和把握叙述聚焦研究在西方学界的嬗变。

在“结语”中，尚必武指出，在叙事学研究的后经典阶段，跨国界、跨媒

介、跨学科是叙事研究的最主要特征。沿着这一“跨”的发展路径，后经典语境下的叙事研究将会迎来更为灿烂的春天。在叙事学研究的“满园春色”之中，中国学者有必要展现出自己的“亮丽色彩”，而尚教授的《后经典》就是其中的一抹重彩。

#### 四、结语

《后经典》的“附录”部分是尚必武对三位当今西方顶尖叙事学研究专家的访谈录：詹姆斯·费伦就修辞叙事学以及当代叙事理论的发展趋势和未来走向发表了看法；戴维·赫尔曼教授就叙事学研究的新发展这一话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布莱恩·理查森阐释了自己对“非自然叙事学”及当代叙事理论的见解（261-290）。研读这些访谈，读者从中处处可见尚必武与当代西方叙事学领域“大师”们的思想交流与观点碰撞。这既表明他对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最前沿的了解，也体现出《后经典》的对国内学界的重要价值。

《后经典》围绕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进程和态势而展开，并通过层层论析揭示出：一方面，后经典叙事学超越了经典叙事学的文学、文字叙事范畴，日渐走向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研究范式的语境化、动态化，在当下叙事学研究中势头强劲。另一方面，后经典叙事学的崛起也引发了一定的误解与问题，颇有澄清和探讨的必要，而本书的“点睛”之处正体现在这后一方面。《后经典》虽围绕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主要流派与核心概念而展开，但其并未对西方知名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观点亦步亦趋。相反，作者在进行评述时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并从中国学者的视角，指出西方学者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如何走出困境，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鉴于后经典叙事学在国内学界相对滞后的研究现状，《后经典》势必成为相关研究者重要的参考文献。

#### 注解【Note】

1. 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尚必武：《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以下仅标注其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责任编辑：杨革新